

河南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

2001 年度项目

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史研究

项目类别：青年项目

学科分类：历史学

项目编号：2001CLS001

主持人：刘志庆

成 员：尚海丽

刘季富

完成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完成时间：二〇〇三年九月

河南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

2001 年度项目

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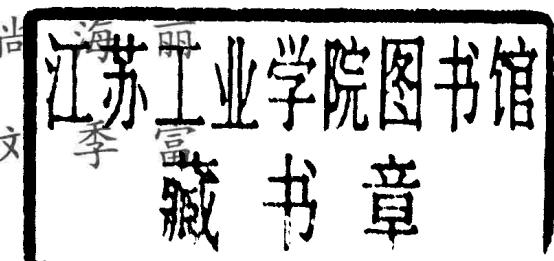
项目类别：青年项目

学科分类：历史学

项目编号：2001CLS001

主持人：刘志庆

成 员：尚海丽



完成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完成时间：二〇〇三年九月

目 录

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史研究概说	1
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及其影响	4
一、60 年间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	4
二、远渡重洋来到安阳的加拿大传教士	6
三、加拿大人的传教活动对安阳社会发展的影响	11
豫北基督教徒信教动因及其构成分析	17
一、豫北基督教徒信教的动因分析	17
二、豫北基督教徒的构成情况分析	21
基督教与豫北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	25
一、基督教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25
二、基督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负面影响	29
基督教会面临的困境及现代化挑战	32
一、豫北各基督教会的自养问题解决得都很不理想	32
二、教会活动堂点与信徒宗教生活需要的矛盾尚存，个别地区的教会房产问题 还未形成一致意见	33
三、缺乏教职员、缺乏有能力的宗教领袖是豫北基督教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 题	34
四、信徒文化素质低下，急功近利的信教观念影响基督教的声誉和发展前途	37
五、豫北教会面临着宗派复活的挑战	38
六、对教会的财务管理问题教会应抱防患于未然的态度	39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安阳传播史略	41

附：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通知书

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史研究概说

中华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简称C.C.C）是20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基督教新教）“本色教会运动”的重要成果和组成部分之一。它正式成立于1926年，是由基督教15个教派的华人教会共同组成的全国性的合一教会组织，它具有两大特点：其一，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教会而不是松散的教会联合体，它具有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建立了从上到下的教会行政机构。它由全国总会——大会（或协会）——区会——堂会四个层级构成。1933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共有16个大会（或协会）、80多个区分、数百个堂会。河南大会是16个大会之一，下设彰磁、卫怀两个区会。其二，作为一个有全国性影响的、规模和力量最为庞大的华人基督教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信徒人数约占全国基督教徒总数的四分之一。

基督新教传入豫北地区始于何时？一般学者认为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主要传播者是加拿大长老会。在此基础上，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了以中国牧师为主、有“自立”倾向的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

相对基督教在全国传播的形势而言，基督教传入豫北的时间较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豫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有28034平方公里的土地，地域辽阔，人口稠密，是小农自然经济形态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其乡村往往“自成核心，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内部关系更紧密，内向性更强”，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地区，和沿海城市、沿江城市以及华北其他地区缺少联系，直到20世纪初，在铁路（平汉铁路）和通讯设施发展起来之后，这里的社会生活仍然没有多大改观。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豫北对外来文化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倾向，《中华归主》即记载：其“昔年排斥西人之举动最烈”，所以，西方各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始终不敢贸然进入该地区，以至这里几乎一直是基督教的“真空”地带。中国近代社会的情况表明，封闭、落后的内陆地区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所以，基督教在这里出现较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河南大会在数十年的时间中经历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尤以抗战时期所受的损失为重。成立河南大会目的在于使豫北教会摆脱加拿大差会的控制，从而建立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本色化的合一教会。它的成立和发展，不仅是基

督教在华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趋势的体现，也是基督教会适应日益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结果。把它作为20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具体实践的代表，考察其演变历程，可以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过程，提供一个具体视角。

河南大会从出现的哪一天起就和加拿大差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它存在的20余年间（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建国前后），一直受加拿大长老会的控制和影响，研究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的历史必须研究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传播的历史。从客观上讲，基督教会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诸如医疗卫生事业、乡村教育事业等，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外研究这一领域内容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已经有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面世，加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不是在教会或宗教活动本身，而是在于探讨加拿大传教士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和中加关系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成果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反映加拿大传教士在华传教全貌的，如Alvyn Austin:《Saving China: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middle Kingdom,1888-1959》，Peter Stursberg:《The Golden Hope: Christians in China》；一类是著名在华传教士研究，如明义士、罗明远等人的传记；一类是在华地区差会和医疗、教育、对妇女解放的影响等专题研究论文。

国内研究这一课题成果较多的主要是一些学者，宋家珩先生、李巍先生等人曾主持完成过《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科研课题，在对豫北及开封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之后，先后撰写出15篇研究论文并结集出版。近年来，本课题组负责人及主要成员，先后组织历史专业学生对豫北六地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豫北的传播及其影响》、《天主教、基督教与豫北的现代化》等课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目前还缺乏对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系统的研究、分析，这也正是本课题设计论证的切入点。

我们认为，研究这一课题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一是从河南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史的研究尚属空白，虽然这在整个河南史中并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河南通史中假如或缺了这部分内容，至少不能说是完整的河南史。二是建国以前，加拿大差会与豫北教会有不解之缘，研究河南大会史实际上有助于研

究西方整个对华传教史和中国的教会发展史。三是近代在豫北工作过的传教士或他们的后人现在仍然十分关注豫北基督教会，如曾任驻华大使的明义德（明义士之子）、著名医生罗维廉的后人、中加友好协会会长柯忠义先生等对豫北都有浓厚的兴趣，研究河南大会史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加关系有重要的作用。

自1888年基督教传入豫北至今，无论是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还是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的神职人员都从来没有想过去完整地记载他们在豫北活动的历史，绝大部分的传教资料也由于时势的动荡、人员的更换而变散逸殆尽。文革期间，由于人为的因素使得本来就留存不多的教会资料又遭到一场浩劫。改革开放以来，豫北六地市宗教管理部门都下了很大功夫去搜集整理本地的宗教资料，但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收获寥寥。一些地方早在1996年就下决心要编写出一本完整的本地市宗教志，但时至今日也未见有什么著作或系统的资料汇编问世，本课题的研究难度可见一斑。所以，研究这一课题虽谈不上会有什么重要创新，但是至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为深入研究豫北乃至我省的宗教史提供帮助。

本研究成果将为豫北六地市的宗教管理部门提供一个较为详细、完整、准确的基督教会的资料，对他们今后在宗教管理方面将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同时，对豫北各地的基督教会而言，他们将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历史，从而坚定走“三自”之路的信念。

从立项至今，我们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宗教类核心期刊《世界宗教研究》、南京大学宗教所主办的《宗教》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篇，受到有关专家好评。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目前还只能说是专题研究，不能称为系统的河南大会史，和预计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差距。由于经费、时间以及客观条件所限，也只能到此结项。当然，我们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剩余的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有些内容不久将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不足之处，尚请方家见谅。

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及其影响¹

内容提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安阳等地为中心的豫北基督教传教区是加拿大长老会在海外传教的三大重要区域之一。1888年，加拿大长老会派遣以古约翰牧师为首的7名传教士来到豫北，后来建立了以安阳等地为中心的三个传教总站，信徒人数从零发展到万余人。由于时局的影响，60年间长老会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长老会先后向安阳等地派出150多名传教士，其中包括专职传教士、医生、护士以及从事教育、秘书和其他工作的人员，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疗卫生技术，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建立教会学校，提倡男女平等，等等，客观上参与促成了安阳的近代化，这些积极影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关 键 词： 加拿大长老会 安阳 影响

19世纪后期，加拿大长老会选定豫北作为其海外传教的重点地区。他们为什么会选中豫北地区呢？中国近代社会的情况表明，封闭落后的内陆地区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近代豫北的情况正是如此，它和沿海、沿江城市以及华北其它地区缺少联系。豫北的乡村一般都“自成核心，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内部关系更紧密，内向性更强”。“该地区的乡村所具有的政治结构，一般均于地方社会内部生成，很少受外来的影响。”《中华归主》记载，该地区“昔年排斥西人之举动最烈”，所以，西方各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始终不敢贸然进入该地区，² 以至这里几乎一直是基督教的“真空”地带。正因为如此，加拿大长老会认为，“再没有比这个更有兴趣、更重要的地区了。”而作为豫北重镇的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传教地图中的首选目标。

一、60年间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

光绪十三（1887）年，黄河决口，豫北地区灾情严重。第二年，长老会派遣多伦多大学的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夫妇、皇后大学的史雅格（James F. Smith）

¹ 本文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² 《河南省志》第九卷，总纂邵文杰，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十三篇宗教志，第154页。

医生夫妇、蒙特利尔总医院的总监罗维廉（William McClure）医生、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牧师、哈里特·萨瑟兰（Harriet Sutherland）小姐等7人——加拿大人称之为“河南七贤”——携带在国内募集的救灾款来豫北施赈、传教。光绪十六（1890）年夏，古约翰牧师、罗维廉医生、尹慈谋（Murdo Mackenzie）牧师等人在豫北的交通门户、卫河岸边的楚旺（今内黄县楚旺镇）设立诊所，借医传教。光绪二十一（1895）年，古约翰、季理斐等人在彰德购地建造“耶稣堂”，创立第一个传教中心——彰德传教总站³

然而，好景不长，光绪二十五（1899）年，山东、直隶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波及到安阳一带。由于形势所迫，古约翰牧师、雷实礼（Percy C. Leaslie）医生等大部分传教士携妻带子，分乘10辆马车，从陆路往上海避难。

义和团运动之后的20年，是西方教会在华传教的“黄金时代”。而此时的加拿大国内也恰恰进入它的第一个经济繁荣期，这使得加拿大的“传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期”。1901年以后，长老会向豫北教区派出大批牧师、医生、护士和其他辅助人员，他们放弃被焚毁的楚旺和新镇（今属浚县）传教站，新开辟卫辉（今卫辉市）、怀庆（今沁阳县）、道口（今滑县）、修武（今修武县）等传教点，成立彰德、卫辉、怀庆三个传教总站，教徒人数猛增到3300人。开办广生医院（彰德）、惠民医院（卫辉）、恩赐医院（怀庆）三个著名的教会医院，设立牧野中学（卫辉）、斌英中学（彰德）、教会女子学校（怀庆）等教会学校。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政局再次出现动荡，军阀混战使洹河两岸曾一度成为战场，安阳教会的北围墙被挖了许多枪眼，院内到处是军粮、装备和牲畜，门窗桌椅成为士兵们烧火做饭的燃料，教会陷入瘫痪状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加拿大传教士被迫第二次撤离安阳。

在加拿大人离开安阳一年多的时间内，豫北教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27年10月，豫北教会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并被总会命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中华基督教河南大会执行部”办公地点设在安阳教会。河南大会下设彰磁、卫怀两区会，安阳属彰磁区会。中国牧师在加拿大传教士撤离期间单独主持豫北教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领导能力。

³ 民国二十二年修《续安阳县志》，卷十一宗教志；内黄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内黄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卷五，民政志下。

1928年10月，加拿大传教士重返安阳，他们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由主变客”，加籍牧师与华人牧师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为了调解双方的矛盾，上海基督教总会派遣成静怡、范定九两位博士来安阳调解。经过双方妥协，最后形成的意见是：教会从组织形式上摆脱加拿大的控制，但仍接受其差会的津贴，教会的经济仍由加拿大传教士控制。此后各地教会、医院、学校的恢复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教会虽然失去了此前20年间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1938年，豫北三个传教总站的教徒人数达到6000人，平均每地2000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一），日军占领安阳城，教会院内、耶稣堂里、斌英中学、三育女校、广生医院等都住满了难民。1938年5月，土匪趁火打劫，扣押人质向教会勒索钱财，教会再次受到惨重的打击。1939年8月，日本掀起反英高潮，因为加拿大属于英联邦，受到牵连，加拿大传教士只好第三次撤离安阳。此后，皇协会占据铸钟街教会，日军占据广生医院，教会及医院的活动被迫全部停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安阳，局势渐趋稳定。1945年，中国牧师刘成章、董昭德以彰磁区会主席的身份主持教会的恢复工作。1946年1月，张宝箴、胡子铎两位牧师受河南大会指派，到郑州请求公谊救护队前来帮助恢复教会和广生医院。1946年春，公谊救护队一行24人在罗明远（Robert B. McLure）医生的率领下到达安阳，在公谊救护队的帮助下，铸钟街教会、广生医院、斌英中学都得到迅速恢复。

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沿京汉铁路南下，加拿大传教士分批搭乘美国的军用飞机撤离。6月15日，最后两名加拿大人——梅秀英（Isabelle McTavish）医生和麦肯齐（Hugh Mackenzie）两人登上一辆卡车，依依不舍地告别广生医院和铸钟街教会，消失在南去的尘雾中，加拿大差会在安阳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从1888年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实现信徒零的突破到1949年的60年间，豫北的基督教信徒发展到10780人（含1283名慕道友）。1900年以后教徒人数呈正态上升的趋势。其中1888-1900年仅发展教徒82人，到1910年为2729人，1920年为3300人，1938年为6000人，1949年为10780人（含1283名慕道友）。⁴

二、远渡重洋来到安阳的加拿大传教士

⁴ 宋家珩：《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齐鲁书社，1993年，第88-92页；另见笔者从1996年河南省统一进行的调研统计材料中汇总的豫北各地市有关基督教的统计数字。

据笔者统计，60年间先后来安阳的加拿大籍传教士有153人，从他们来安阳时的身份或主要从事的工作性质区分，可分为六大类，即，专职传教士、医生、护士、教育、秘书、其他（农业、商业、手工业或情况不明者），表一详细统计分析了他们来安阳的时间及其工作性质，可资参考。

表一：

加拿大传教士分类情况统计表

时间	合计	传教	医生	护士	教育	秘书	其他	备注
1888	8	5	2	1				
1889	8	6		2				
1892	3	1	2					
1894	2	2						
1895	4	1	2		1			
1896	2	1			1			
1897	3	2	1					
1898	1						1	其他1人不详
1899	2	1	1					
1900	2	1				1		
1902	2	2						
1903	4	4						
1904	4	3					1	其他1人手工业
1905	1				1			
1906	9	7	2					
1907	1	1						
1908	1					1		
1909	4	4						
1910	7	2	1	2	2			
1911	2	2						
1912	11	9			1		1	其他1人建筑业

时间	合计	传教	医生	护士	教育	秘书	其他	备注
1913	3	1	1		1			
1914	7	5	1	1				
1915	6	2	3		1			
1916	1			1				
1917	6	2		2	1	1		
1919	2					1	1	其他1人商业
1920	10	1		3	4	2		
1921	7	3	2	1	1			
1922	6	4		1			1	其他1人不详
1923	4	1		2	1			
1924	2	1	1					
1925	3	2				1		
1926	4	3	1					
1929	1			1				
1931	5	2	1	1			1	其他1人不详
1932	1		1					
1935	1				1			
不详	3						3	其他3人不详
合计	153	81	22	18	16	7	9	

资料来源：

- ① 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之附录《加拿大长老会派往豫北的传教士名单》，东方出版社1995年1月版。
- ② 笔者亲访王惠广先生笔录及王惠广先生手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名录”。

从加拿大传教士来豫北传教的时间来看，几乎全部集中在1888-1935年间，而高峰期则出现在1900-1920年间。

在安阳的加拿大传教士就其具体表现而言，又可分为三大类型：即，以古约翰、尹慈谋、石美丽等为代表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把向海外传播基督教文明视为自己

的生命，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以罗维廉、季理斐、明义士等为代表的学者型传教士，他们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医疗卫生实践等为豫北社会做出了贡献；以范铭德、罗明远、米切尔等为代表的热情奔放的年轻传教士，他们以改造豫北社会、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为己任，为安阳乃至豫北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虔诚的基督教徒是开创豫北教区的骨干力量

表一显示，在153名加拿大传教士中，专职传教士有81人，占全部人员的52.9%，这是加拿大传教士的主体。

古约翰牧师，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诺克斯神学院，1887年6月，被长老会任命为牧师，第二年携夫人罗莎琳德·贝尔-史密斯（Rosalind Bell-Smith）——一位情愿放弃自己的艺术专业而陪伴丈夫来中国传教的勇敢女性来到安阳一带传教。古约翰牧师在安阳的传教生涯长达48年，他“有着敏锐的头脑、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执着的追求；他充满热情，勤勉而不知疲倦；他忠实于正义，陶醉于上帝——完全信服于和奉献于上帝。”⁵ 他的口头禅是，“不让自己虚度一周而没有为上帝工作”。为了传教，古约翰牧师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他的两只眼睛因视网膜脱落而先后失明，11个孩子中有5个死在中国，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传教决心。正是有了他，加拿大长老会才有了豫北教区，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诺克斯神学院后来授予他神学名誉博士学位。

2、学者型传教士在学术领域有突出贡献

这部分传教士主要集中在表一的医生、教育类中。在153名加拿大传教士中，学者型传教士所占的比例为24.8%。

加拿大人引以为骄傲的海外文化传教士有两名，一位是开封圣公会的怀履光主教，一位是安阳的明义士牧师。1910年，25岁的明义士（James M. Menzies）牧师被长老会派到安阳。1914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殷墟”，后来成为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据虔诚的基督教徒、原齐鲁大学毕业生、安阳基督教会的“活字典”王惠广先生⁶ 回忆：“我和明义士牧师很熟悉。他个子不高，不常讲道，喜欢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常常一个人呆在小楼里搞研究。我曾经问他是怎样发现小屯

⁵ 转引自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38页。

⁶ 本文的初稿曾得到王惠广先生的精心指点，先生不幸于2000年初去世，谨此致哀。

有甲骨片的，明义士说，有一次，他无意之中走到教堂西北方向的田地里，在一条流着水的垅沟（安阳一带把流水浇地用的小水渠叫垅沟——笔者）岸边看见有一些被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甲骨片，有些上边还有字，于是他就发生了兴趣，顺藤摸瓜找到小屯，后来他又查了安阳县志，知道这一带古代就有‘龙骨’。他喂了一匹白马，常常骑马到小屯一带去搜集甲骨片。我上齐鲁大学时，明义士曾在齐鲁大学任教（1932年，明义士应聘到齐鲁大学任考古学教授，主讲过甲骨学研究——笔者），因为我俩都来自彰德教会，所以他待我特别好，常让我去他的办公室，问一些安阳教会的事，他的屋子里有许多陶器和甲骨片，有好几架。”⁷ 王宇信先生评论道：“明义士对小屯每宗甲骨出土及流传情况，因‘身临其境’而了如指掌，故所著《甲骨讲义》（1933）记载最为准确、详赡和具有权威性。”⁸

3、年轻一代传教士为安阳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这部分年轻传教士分散在表一的传教士、医生、教育和其他等类型中。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第一代传教士的后代，有些人甚至在豫北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年轻一代传教士的思想和他们的父辈有明显的差异，在他们眼中，传教和改造豫北社会是同等重要的。

罗明远，罗维廉医生的儿子，安阳人亲切地称之为“小罗医生”。1901年夏，不足周岁的他被母亲带到豫北。他从小在卫辉长大，对卫辉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能讲一口流利的、带河南口音的汉语，甚至在家中也不愿说英语，他的父亲不得不在家门口划一道线，规定进入线内必须说英语。他在加拿大读完大学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他为之神往的第二故乡——中国豫北。他医术高超，人们常把他和著名的白求恩医生相提并论。抗战期间他曾到过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接见，也曾多次帮助过白求恩医生和延安解放区。25年间，他的足迹踏遍了豫北大地上，构建了一个名震中外的农村医疗网络，为豫北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有许多先进的思想，并大力在豫北地区付诸实施。如，每年夏天，罗明远医生都要来安阳为“夏令神道学班”的传道员讲道，出于职业习惯，他讲的最多的是计划生育的话题，每次都是男女分开讲。他给传道员讲避孕的知识，并拿出避孕工具让人们看，还现身说法，说自己用了哪一种工具无效，结果生了那个孩子，并告诉人

⁷ 1998年10月14日下午，笔者在安阳市学巷街王惠广家中采访王惠广和他的长子笔录。

⁸ 王宇信著：《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们哪一种比较有效。“听讲的教徒们被他的讲解所吸引，当然也有些教徒羞得抬不起头来，对安阳这样较为闭塞的地方来讲，这些知识甚至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他还从加拿大带来一些银质的避孕环，让银匠依样打制，“有些不愿生育的女教徒就戴上了这种银环，真的起到了避孕的效果”⁹

这些年轻传教士的思想在当时就受到老一代传教士的批评，认为这是舍本而求末，如景佐智（George K. King）牧师就曾批评道：“你们将注意到，虽然乡村工作进行了相当大的宣传，但总的看来，我们差会仍继续坚持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传播福音这一观点。”这也正是老一代传教士和年轻传教士的重大区别之所在。虽然，由于时局的影响，他们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并没有能够取得深入的进展，也没有营造出什么“基督教文明”，但是，这无疑对豫北社会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三、加拿大的传教活动对安阳社会发展的影响

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传教的60年间，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而且不可逆转地迈进了近代化的旅程。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加拿大人在安阳的传教活动确实参与促成了安阳的近代化，他们引进西方医疗卫生技术，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建立教会学校，提倡男女平等，等等，这些积极影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1、借医传教客观上促进了安阳的医疗卫生事业

西方传教士陶斯威特曾坦白地说：借医传教是西方教会所惯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医生每天与病人接触，他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综观加拿大长老会在安阳的传教实践，确实如此。表一清楚地显示出，在统计的153名加拿大传教士中，占第一位是专职传教士，而占第二、三位的是医生和护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行医和传教的互补性。

罗维廉医生（安阳人称“老罗医生”）是打开豫北传教局面的关键人物。在来安阳之前，他是蒙特利尔总医院的总监、加拿大国内著名的医生，是脑炎和震颤麻痹的诊断、治疗专家。1890年，罗维廉在楚旺镇南街（现内黄县二中）租得一处住所，开了一个男科诊所兼简易教堂（一间房子作为老罗医生的诊室，一间房子作为古约翰等牧师传道的讲堂）。为了吸引安阳人信教，教会诊所是不收费的。老罗医

⁹ 1998年10月14日下午，笔者在安阳市学巷街王惠广家中采访王惠广和他的长子笔录。

生的诊室配备有较齐全的医疗设备，如手术器械、高压消毒器、注射器、不锈钢针头等器械和磺氨粉、阿斯匹林、奎宁等药品。他除为当地人诊治常见的内科、外科病之外，还经常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如切除白内障等。1894年，罗维廉的诊所随教会迁到安阳铸钟街，规模也逐渐扩大，成为教会的支柱之一，每年施医达四、五万次。¹⁰

1912年，在雷实礼医生主持下，¹¹ 教会在安阳城北西段河堤外（今安阳市解放路西段）购地55亩，创办广生医院（今安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安阳人称为“西洋房”（铸钟街教会为“东洋房”），俗称男医院。¹² 原铸钟街教会诊所改为女医院。1931年男女医院合二为一，安装了发电房和供电系统，修建水塔，铺设自来水管道，增加了1台X光机和1张手术台，床位增加到70张，其中男病床40张，女病床30张。一些最新的医学技术在广生医院得到应用，如镭放射器开始被用于治疗恶性肿瘤，血、尿化验和康乐化验已经作为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¹³ 广生医院成为近代安阳最先进的医院——也是豫北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该院目前仍是安阳市首屈一指的医院），当年即治疗病人6820人次，手术166例，1933年治疗116777人次，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开办医院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开诊所、办医院，长老会打开了在安阳的传教局面，吸收了大量的信徒。

古约翰牧师率领“河南七贤”来豫北之前，确定的传教设想是“依靠上帝，不依靠力量”，然而，当他踏上楚旺这块神秘的宗教处女地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设想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用好奇的眼光盯着这位留着红辫子（假辫子）的“洋鬼子”。他在村里布道时，经常会有人猛然从他背后推一下、踢一脚，甚至是扔过来一块砖头、土块。以致他不得不采取背靠墙的方式讲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牧师们几乎一无所获，只好把传教的希望寄托在罗维廉医生身上。罗维廉靠精湛的医术征服了当地群众，慕名而来求医者络绎不绝，医生的光芒盖过了上帝的灵光，在老罗医生的诊所迎来了第一批皈依基督的信徒。

¹⁰ 民国二十二年修《续安阳县志》，卷十一宗教志。

¹¹ 安阳档案局资料，《接收帝国主义遗留财产广生医院的总结》，卫生档，第33号。

¹² 《安阳市郊区志》，安阳市郊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标准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三章宗教。

¹³ 《安阳市人民医院志》。

安阳第一代基督徒的产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内黄县南伏恩村的王求贤（基督教徒，曾任斌英中学的副校长）的母亲有病，罗维廉听说后，从楚旺步行几十里亲自到南伏恩村免费为她治病，当她病好之后，全家都皈依了基督教；安阳县土楼村的张颜臣（原基督教会长老）的父亲患有严重的胃病，用尽全家的积蓄也不见好转，老罗医生免费为他治好了胃病，结果全家入教；安阳县高庄乡尊贵屯的韩华庭（韩老华），原是六合沟煤矿的矿主，染上了大烟瘾，教会诊所为他戒了烟瘾，全家入教，其孙女韩玉芹现为安阳教会牧师。

第二，广生医院的创立直接导致西医传入安阳，为安阳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

在此之前，安阳只有一些中医诊所，广生医院引进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以雷实礼医生等为代表的西医以其精湛的医术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广生医院招收一些安阳人作学徒，后来有的学徒成为医术高超的名医，如内黄县籍的基督徒张汉卿在雷实礼医生的精心培养下，成为广生医院的“第二把刀”。20年代前后在安阳出现的西医诊所大都是广生医院的中国学徒开办的，如，贺子宾开办的“福华医院”，张汉卿开办的“张汉卿诊所”等。这些诊所后来又培养出董玉堂、石秀峰、张凤梧、石云生等西医，解放后，他们都成为安阳医疗卫生界的骨干。

2、教会学校客观上对安阳的近代教育起到了辅助作用

加拿大传教士热衷于文化教育活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化传播规律使然。经过义和团的打击之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传播文化必须在总的文化势能上或在某一方面的文化要素中具有较高的势能或优势，能够改善和丰富人类生活，才能够有传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豫北社会迫使他们做出的选择。1902年，清政府规定，学校每天都必须举行尊孔“礼拜”（基督教徒是不能参加的）。为了给基督徒子女提供一个适宜的学习环境，更为了加速发展基督教，基督教会也加入到安阳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客观上为安阳的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教会在铸钟街教会开办“圣经学校”，校长是吉利斯·伊迪（Gillies Eadie），这是一所启蒙男学堂，仅有学生20名，全部来自基督教家庭，由学校发给少量伙食费，学习内容有《圣经》、四书五经等，该校在1900年义和团

运动中被迫关闭。¹⁴ 1904年前后，“圣经学校”改名为“贤英学堂”，1915年，又改名为“斌英初高两级小学校”，明义士牧师任校长，副校长为毕业于北京崇实学堂的本地信徒王求贤。学校开设诸如物理、化学、语文、英语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类的课程”，建立了先进的理化实验室等。

1906年，教会设立三育女子小学，由白教士（Minnie A. Pyke）任校长。其开办时间比清政府学部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1907年）允许设女子小学堂还早一年，开创了安阳女子教育的先河，对安阳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20年代，三育女校增设初中班，校名改为“三育女子初级中学”，由温晨旭（Winifred Warren）教士任校长、中国信徒王玉温任副校长。1925年，全校中小学生达200多人，“由于学校教育刚刚兴起，许多女生还裹着脚。”¹⁵

1931年，斌英中学和三育女校合并，到1937年已有学生343名。后来，斌英中学由于战乱而时办时停，1947年，随着加拿大人的撤离也宣告停办。

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城乡开办的男女学校是安阳近代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教会学校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培养出一大批教会骨干和领袖人物，如斌英学校副校长王求贤、三育女校副校长王玉温、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主席张宝箴牧师、彰磁区会主席刘成章牧师、胡子铎牧师、广生医院的“第二把刀”张汉卿医生、齐鲁大学毕业生王惠广等。

3、传教士在安阳推广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铸钟街教会对面路南有教会的农场，占地28亩，由范铭德（D. K Faris）牧师任场长兼技术员。这位年轻而有热情的牧师把全部身心都用到了研究农业生产上，他曾专程到加拿大安大略农学院和考耐尔大学“充电”，并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农场的实践。他主持过许多项目的研究，并和南京大学农学院的田间实验室建立了联系。他在农场还办过一个培养农业技术人员的夜校——“基督教乡村建设领导人训练班”，为安阳造就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后来在许多村庄发挥了作用。他培育出来的阿芙麦、西红柿等新品种享誉中原，农场制作的水果罐头更是远销省内外。

¹⁴ 王惠广：《私立斌英中学的沿革与发展》，《文峰文史资料》（二），安阳市文峰区编，1989年9月。《安阳市民族宗教志》，安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宗教志》编写组，1986年11月，内部资料，第41页。

¹⁵ 程宝真：《“五卅”运动在安阳三育女中》，《安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10月。